

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俄苏郭沫若研究刍议

王虹元

摘要：中俄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五四以来更是高潮迭现，互鉴和影响不断深化。郭沫若作为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身体力行地参与和推动着20世纪两国文学交流与文化互鉴的进程。本文从郭沫若与俄苏文学与文化的结缘说起，回顾他在中俄跨文化对话中的主要贡献，在此基础上梳理苏联学者对郭沫若的译介与研究，最后将目光投向当代，浅析新时期俄罗斯郭沫若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关键词：郭沫若 费德林 屠格涅夫 俄苏文学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俄文化年”（2024—2025年）框架下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也由此拉开帷幕。回望历史，两国间文化交往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古罗斯时期。在文学交流方面，“中传俄”的历程长、种类多，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俄传中”虽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才起始，但在百余年内蓬勃发展，甚至后来居上。而在20世纪两国文学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中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郭沫若与中俄文化交流

郭沫若与俄苏文化结缘甚早，自1914年起求学日本期间，便已初识俄国文学，而伊万·屠格涅夫（1818—1883年）是他最早接触到的俄国作家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欧化政策，在此背景之下，许多俄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日本，对当地文化界、思想界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屠格涅夫的小说以其新颖的写作风格、尖锐的社会道德议题，以及贴近东方哲学思想的精神内核，颇受日本读者喜爱。有日本学者认为，完全可以将明治时代称作“屠格涅夫时代”^①。

早在1921年，郭沫若就已经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五首早期诗作^②。1924年，他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完成后，便着手翻译屠格涅夫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的小说《新时代》——今天我们更熟悉的中文译名是《处女地》。郭沫若被小说中反映的社会革命思潮所吸引，决定翻译此书，以德文版为底本，英文版为参考。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1917年）中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随之开启了中国新旧文化的重要转型期。虽然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译者像郭沫若这样通过英日德法等其他语种转译作品，但也有一批精通俄语的青年译者（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等）初露头角。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俄国文学译介热潮。俄国文学真正开始为中国文坛所关注，译介也趋于集中化、系统化。^③

学者刘奎指出，郭沫若在小说主人公涅日达诺夫身上看到与自己的相似之处，而后者恰好构成郭沫若个人成长的镜像映照：“在他完成思想转变之前，他已经在虚拟的小说中，经受了一次思想革命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而这本小说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景又与俄国的实践得以相互参证，为郭沫若的自我选择提供了一个先于实际行动的预演。”^④因此，这部小说对于郭沫若思想转变的完成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彼时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获得精神共鸣的中国知

① *Малинина Е. Е.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и Кавабата Ясунари. Опыт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 // Сто лет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Японии / Под ред. Л. Л. Громковской. М.: Наука, 1989. С. 92.*

② 李明滨、查晓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③ 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72页。

④ 刘奎：《郭沫若的翻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24—192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第22页。

识分子远不止郭沫若一人。如李明滨、查晓燕所说，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他笔下那些善良而软弱、浪漫而忧郁的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所展现出的时常是“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真挚厚重的乡土恋情，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极大热忱，自我反省的敏感细腻”，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知识阶层的气质与心态相契合，因此“屠格涅夫对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启蒙、感召和引导，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①。

郭沫若在小说中读出屠格涅夫“缓进派”的政治倾向，他本人的态度则恰恰相反，认为需要通过激进的政治革命来解决问题，而支撑他这一信念的历史事实便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袁荻涌所言，“郭沫若对苏联文学的认同，既有政治上的需要，又是其文艺思想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非文学的因素是更具决定作用的”^②。

对于这个问题，同样需要考虑的是郭沫若的留日背景。学者熊辉认为，当时许多激进的革命者都是从留日学生中产生的：“留日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走向左翼化，从而使中国诗歌染上革命色彩。”^③熊辉在此处特以郭沫若的名诗《女神》《凤凰涅槃》为例，说明中国新诗语言在上述影响下，革命性和政治性色彩的强化。

1929年，郭沫若和李一氓合作翻译了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作品在内的新时期俄苏诗歌，先由李一氓根据英文版诗集译出中文，再由郭沫若比照英译润色修改。该书起初以《新俄诗集》为题发行，很快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随后又取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题目，更名为《我们的进行曲——新俄诗选》再版。这是我国最早汉译出版的苏联早期诗歌合集之一^④，从形式、风格和主题等诸多方面展示了苏联新诗的潮流走向。这本诗集中，还包含了“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

① 李明滨、查晓燕：《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俄苏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0—51页。

② 袁荻涌：《郭沫若与中苏文学交流》，《文史杂志》1990年第5期，第5页。

③ 熊辉：《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④ 邱宗功：《郭沫若前后译介马雅可夫斯基史实述评》，《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4期，第55页。

娜·阿赫玛托娃的两首抒情诗，正是郭沫若最早将她的诗作译介到中国。

此外，郭沫若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还有一段渊源。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知识界掀起自五四之后的又一次俄苏文学交流热潮。郭沫若在瞿秋白的建议下，尝试以德语版为底本，参考英、日译本，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惜未能完成。所幸，抗日战争期间，青年译者高植由俄文直译了这部小说，因对郭译文本有借鉴和保留，遂写信给郭沫若询问是否可以署名为合译。郭沫若欣然应允。不过高植指出，郭沫若的转译文本中存在与原文不符的内容^①，这一点也可以想见。文学作品经过几重转译呈现在读者面前，早已是作者与译者们的共同创作，跨越语言文化的屏障，与原著之间的差异亦不免几度增加。

这些“硬伤”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审慎判断这些译本的可参考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的桥梁作用仍在。桥是途径，或许不能像陆地那般平稳，但还是可以提供便利，使人抵达对岸。

除了翻译俄苏文学作品，郭沫若还曾积极为中国文艺发展引入苏联经验。在《中国作家致苏联人民书》中，他写道：“我们已经有了极丰富的素材，我们还得学习怎样至善地来处理这些素材的方法。……凡是苏联的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的文化，都是我们绝好的滋养品，我们希望有能够多多接近的机会。”^②

1945年，郭沫若正式提出“人民文艺”的概念，将其与“庙堂文艺”对立起来，强调文艺的民主精神。研究者戎琦指出，这一概念“相当于文艺上的统一战线口号，凸显的是反抗专制意义上多种文艺样式和多种文艺力量的联合”^③，也寄托着郭沫若对未来国家文艺发展的构想。

① 王慧：《转译之困与惑——谈郭沫若的俄苏著作翻译》，《翻译研究》2013年第2期，第52—53页。

② 《郭沫若与苏联友人的往来信函》，《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第71页。

③ 戎琦：《郭沫若“人民文艺”概念的提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第138页。

同年，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作为文化界代表出访苏联，随后将途中记事整理出版，后成书为《苏联纪行》。关于郭沫若发表记事的意图，李斌写道：“作为在1945年逐渐达到高潮的国内民主运动的重要领袖，郭沫若访问苏联的重要任务是向民盟等活跃在重庆民主战线上的人士传递共产党执政的优越性这一讯息，以此为中共在民主协商中争取筹码。”^①虽然在记事中存在“溢出作者主观意图的大量细节”^②，郭沫若游历苏联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主要还是围绕着彰显苏联建设成就与体制优越性这一主线展开的。

在苏联参观考察期间，郭沫若特别留意到苏联当局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比如，乌兹别克的女子中学“授课均用乌兹别克语，俄语只是第二必修科，作高级研究的准备”^③。他感叹集体农庄的农民文化水平很高，欣赏得了古典乐，同时民族艺术、风俗和信仰又得以保存和延续，直称“新的乌兹别克是人民的乌兹别克”^④。这些见闻启发了郭沫若对中国地方自治、方言文学等问题的思考。“尊重民族形式”^⑤是苏联留给郭沫若的重要印象，而他所提出的“民主的一元内容，民族的多样形式”正是源自苏联文化“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 форм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культура）这一纲领性表述。

最后，将自己的访苏之行与玄奘赴印度^⑥作比的郭沫若深知并力图改变两国文化交往的失衡状况。苏联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国现代的社会与文艺却知之甚少。早在1940年的《中苏文化之交流》中，他就曾指出：“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

① 李斌：《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第43页。

② 同上。

③ 郭沫若：《苏联纪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67页。

④ 同上书，第383页。

⑤ 同上书，第392页。

⑥ 同上书，第323页。

以说是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①他将此归因于中国新文艺尚且短暂的发展和作家修养、作品水准的实际缺陷，反省同时也提出了加强双向合作与交流的期望。

基于这种信念和期望，1945年访苏期间，郭沫若面向苏联文艺界做了《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中国文学的两条道路》等报告，更身体力行，积极促进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在苏联的译介出版。比如，1957年，郭沫若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Федоренко）合编的四卷本《中国诗歌选》（*Антолог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在莫斯科问世。其中第一卷收录的作品涵盖了自商至隋的各种风格和流派；第二卷收录了唐、宋至清的的抒情诗与哲理诗；第三卷收录的作品自元代起，更加偏向现实主义和政治主题；第四卷所收录的则是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诗歌，其中也包括郭沫若本人的创作。

在郭沫若向苏联推介中国新文艺的过程中，他本人作为新文艺创作者所写下的诗歌、戏剧等作品也在其中发挥了切实的作用。此外，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著作作为苏联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简要回顾一下苏联对郭沫若的研究情况，并以费德林为例，一瞥郭沫若与苏联汉学家的交流与合作。

二、苏联对郭沫若的译介与研究（以费德林为例）

2017年，学者宋绍香撰文梳理了郭沫若著作在苏联的发表和研究情况。虽然并未完整罗列，但这篇文章足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苏联学界对郭沫若的接受状态和趋势^②：自20世纪40年代起，苏联《文学报》《国际文学》等报刊便开始陆续译载郭沫若的作品。50年代至60

①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② 宋绍香：《郭沫若著作在俄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29—238页。

年代初，译介与研究迎来高峰。除了文章中列举的1953年单卷本《郭沫若选集》、1958年三卷本《郭沫若文集》等合集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1956年《奴隶制时代》^①及1961年《十批判书》^②等思想史、考古学论文集的俄译版本相继问世。

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看，苏联对郭沫若著作译介与研究的高峰时期也正是两国文化往来最为深入和热切的阶段。当然，如刘亚丁所说，“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苏的政治关系被称为联盟关系，但在文化上中国依然是被苏联的学界塑造为从属性的存在”^③，以高尔基为泰斗的苏维埃文学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家，也包括郭沫若的创作。然而，当郭沫若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到苏联，这种以单向影响为主导的失衡格局也显出它的另一种面向，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也被展现给苏联学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在苏联的文艺批评中，郭沫若的首要身份是爱国作家、民族诗人、和平卫士，他的创作是和民族解放与复兴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的。在新中国文艺领域担任诸多要职的郭沫若与苏联学术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担任“加强民族间和平”斯大林国际奖评委会副主席，并于1951年成为该奖项得主之一。

1952年，费德林撰写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得主郭沫若》出版，1961年亦有两部研究郭沫若的专著问世，分别是伊丽莎白·齐宾娜（Елизавета Цыбина）的《郭沫若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创作（1937—1945）》与斯维特兰娜·马尔科娃（Светлана Маркова）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齐宾娜在专著中强调，郭沫若在剧作中选取历史上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此激励现实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

① *Го Можо. Эпоха рабовладель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 пер. Л. С. Переломова, М. Г. Прядох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② 俄译正标题为《古代中国哲学家》，参见 *Го Можо. Философ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 общ. ред. и послесл.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③ 刘亚丁：《郭沫若的两篇俄文轶文——兼述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郭沫若学刊》2016年第2期，第22页。

志^①。马尔科娃则看到，郭沫若诗歌中的本土诗词及民间歌谣传统、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等因素如何交融，在自成风格的书写之中顺应新的时代精神。^②此外，诸多以五四运动、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文学为主题的学术著作，也都论及郭沫若的创作，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其艺术与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在研究郭沫若创作的苏联学者之中，费德林是尤为特别的一位。两人之间不仅是作者与译者兼研究者的关系，更在学术研究、理想志趣等方面维系着可贵的师友情谊。

1950年，郭沫若为史剧《屈原》俄文译本作序时写道：“译者费德林博士是屈原研究的专家，当这个剧本的写作和演出时，他也正在重庆；我是怎样写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演出时的一般反映情况是怎样，他知道得很清楚。因此，费德林博士可以说是再适当也没有的译者了。”^③

可以说，郭沫若与费德林正是因屈原而结缘的。根据费德林的回忆，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40年的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费德林当时正在使馆供职，郭沫若前来要求订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当时的费德林正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为题写作博士论文，并将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

费德林自1939年起从事外交工作，在中国的十二年间进行语文学研究，和众多中国学者有过交流，亦在屈原研究方面向郭沫若请教颇多。费德林对屈原的研究，包括博士论文的写作，都离不开郭沫若的指导和点拨。1942年，《屈原》剧本正在创作时，费德林还曾到郭沫若一家位于工人住宅区的简陋木屋拜访。他特意提到郭沫若妻子于立群的贡献：“夫人于立群把孩子安置在他们的住房里，那里比其他房间暖

① Цыбина Е. А.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Го Мо-жо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1. С. 48.

② Маркова С. Д.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Го Можо.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1.

③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和，她自己则到丈夫的工作室去。郭沫若在创作剧本时特别需要于立群的建议和帮助，于立群在前不久还是个话剧演员，对戏剧很热爱。”^①

对剧本主人公的深入了解和与创作者的熟稔为费德林翻译此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翻译过程中，郭沫若还将剧本中出现的古体诗译成现代汉语，协助费德林更好地完成译文。按照郭沫若本人的论述，尽管剧本情节中存在对现实经历的反映，有许多设定其实是出于对象征意义的考量。比如两个虚构角色——忠于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和救屈原出走的卫士——分别象征着哀婉怀旧和激奋斗争的感情^②，而婵娟之死也就昭示着屈原的变化和选择。费德林则认为屈原这个复杂而综合的人物形象，除了包含屈原本身的生平与特质之外，还融合了郭沫若自传性的经验和感受。在这部以古喻今的历史剧作中，上文提到的激越奋斗也正体现了郭沫若面对黑暗时局的愤慨与斗志。

费德林不仅将剧作《屈原》引入苏联，还参与翻译或主持编辑郭沫若作品的俄文版本，数次为出版物作序，论述郭沫若作为学者和作家的生平与成就。他尤其看重郭沫若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广泛涉猎，认为这些为郭沫若创作风格和主题的形成铺设了坚实的基础。他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出发，反观其文学创作，认为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压迫关系的深入洞察催生了他对社会制度的质疑和反叛，加之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与苏联经验多有学习和了解，这种种因素都参与塑造了其文学创作的题材主线。

在1990年版《郭沫若文集》的序言中，费德林将郭沫若诗歌的吸引力归于其英勇的、浪漫主义的激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对人民力量的信心，对革命理想的忠诚^③。而汉学家对郭沫若人格品性的理解除了来自对其作品的细察，与他们的友谊与交游也不无关联。

① [苏]费德林：《我译〈屈原〉的前前后后（节）》，唐鸿棣译，《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26页。

②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第250页。

③ *Го Можо. Сочинения: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Драмы.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 сост. и вступ. ст. Н. Федоренко.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郭沫若的主要文学与学术代表作几乎都曾在苏联出版，而对其作品的研究与译介同时推进，在两国文化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欣欣向荣，成果颇丰。

三、当代俄罗斯郭沫若研究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民族解放运动中杰出的文化领袖，郭沫若在苏联汉学领域享有盛誉。在当代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仍然屡屡出现郭沫若的身影。多元的研究视角、扎实的文本分析，让我们看到俄罗斯郭沫若研究的广阔前景。

2004年，汉学家马尔科娃的专著《二十世纪层折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特写》^①问世。稍早前我们曾提及她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研究。此处“层折”之“折”（излом），典出唐代魏征《出关》中的一句：“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其中“九折”意味着某种几乎不可逾越的骇人之物。全书内容按照“第一折”到“第十折”的次序编排，以杰出诗人为主要代表，串联起20世纪中国风云激荡中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越过这重重曲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无穷的困苦与艰难，因此本书的体裁也被定义为“生存特写”（очерки выживания）。

在我们看来，虽然这一著作并不专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但因马尔科娃作为资深汉学家的经历和反思性的回望视野，该书在后苏联郭沫若研究中具有独特的、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探讨了生长中的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引力与排斥，家国征途与个人选择之间的羁绊与张力，而涉及郭沫若生平与诗歌创作的部分在书中占比颇多，一方面是来自马尔科娃早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郭沫若其人其事在这一叙事中的分量。

纵观近十五年的俄罗斯学界，研究者们以各种视角切入郭沫若

^① Маркова С. Д. Кита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 изломах XX века: очерки выживания. М.: Гуманитарий, 2004. 马尔科娃已于2001年去世，享年77岁。

研究：民俗、翻译、类型学比较，或是围绕作家的异国生活经历探究跨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尤莉娅·列梅什科（Юлия Лемешко）在民俗研究中，关注到郭沫若诗歌中传统年画的意象^①；波琳娜·波罗尔（Полина Пороль）以郭沫若《天上的街市》为例，试图分析中国诗歌的翻译特点和文化考量^②；尤莉娅·索罗金娜（Юлия Сорокина）基于郭沫若求学日本的经验，例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对中国作家生平创作的影响^③。

叶莲娜·博尔德列娃（Елена Болдырева）以中俄文化进程中的相似趋势为背景，比较了郭沫若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与创作，发现两位诗人艺术世界之间的诸多母题呼应，包括但不限于“我是无产者”的宣言、诗歌与武器的类比、对创作改造世界之力的信念、对旧世界的去审美化描绘、对英雄主义的歌颂、对独一无二诗歌宇宙的感知、太阳与星辰的固定意象，等等。文章以二者迥异的命运走向收束：马雅可夫斯基逐渐感受到不安、怀疑和折磨，最终悲剧作结，而郭沫若穿过荆棘，走向星辰。^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的研究生罗曼·安德罗先科（Роман Андросенко）师从汉学家罗流沙（Алексей Родионов），专事郭沫若研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他关注郭沫若的治学心理与思想观念，近年见刊的文章有《中国院士郭沫若及其对儒家

① Лемешко Ю. Г. Го Можо о народной картине няньхуа // Вестник Ам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010. № 48. С. 166–168.

② Пороль П.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Го Можо «Рынок на небе») //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и 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Брянск, 2021. С. 78–82. 作者为人民友谊大学副博士研究生。

③ Сорокина Ю. А. Влияние Японии на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на примере Го Можо) // Китай и соседи.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6-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лодых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С. 355–360. 作者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本科三年级学生。

④ Болдырева Е. 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культурный диалог: Го Можо — «китайский Маяковский» //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20. № 4 (115). С. 169–182.

思想的态度》^①《学术热情与动机——B. M. 阿列克谢耶夫与郭沫若院士的经验》^②。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以郭沫若的《诗经》今译之作《卷耳集》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卷耳集》诞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分析了其中的具体篇目，考察了前后形成的三个版本，并附上了40首新译版诗歌的逐字俄语译文。安德罗先科尤其强调郭沫若的翻译观（即反对死板的逐字翻译），因此主张将郭译视作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诗歌作品。他在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郭沫若在其白话新译中使用了传统诗歌的众多技巧，同时加入了创新元素，即叹号、破折号等标点；此外，《卷耳集》的创作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恋情，而他的翻译也是极其自由的，加入额外的细节的想象，乃至脱离了《诗经》原有的情节。^③

不可否认，当代俄罗斯的译介和研究在数量和系统性上不及苏联时期，而正是前期的积累为如今俄罗斯研究者的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奠定了最初的基石。青年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前景或可展望。也期待他们的研究和翻译成果能够汇入长河，让俄罗斯学界再从郭沫若研究中挖掘出更多新意。

四、结语

回望郭沫若的早期诗作，首部诗集《女神》开创一代诗风，《凤凰涅槃》则预示着祖国的新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与他对外国诗歌（包括但不限于俄国诗歌）的接受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外国翻译

① Андросенко Р. А. Китайский академик Го Можо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у // Studia Culturae: Вып. 1 (35). С.143-153.

② Андросенко Р. А. Научный энтузиазм и мотивация: опыт академика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и опыт академика Го Можо // ГАУДЕАМУС. 2022. Т. 21. № 1. С. 103-110.

③ Андросенко Р. А. Го Можо и его сборник переводов песен из «Шицзин» «Цзюаньэр цзи». Вып. квал. раб.: 58.04.01. СПб, 2021.

诗歌的影响成就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歌史上的地位”^①。然而诗歌只是数十年间对话与互鉴的起点，译介和推广俄苏文学文化，也只是郭沫若作为肩负重任、求索不渝的知识分子积极为国为民探索文化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种途径。

对于处在激荡和变革中的中国，俄苏文化不仅是可资借鉴和模仿的对象，更是积极参与跨文化对话的一方。中国古典文化与新时期文艺探索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俄苏学界关注。郭沫若访苏期间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广，以及他与苏联汉学家的紧密合作，都为两国文化互鉴开辟了新的宝贵通路。

在俄苏汉学家笔下，郭沫若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的中国知识界代表，是文化视野遍及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文学家，是兼具学识与情怀的忠实朋友。在当代郭沫若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深挖文本细部、注重跨文化翻译实践、拓宽文化语境等多样化的趋势，政策性与自发性的研究双线并行，相信在未来仍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① 熊辉：《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页。